

談新住民實踐社區服務 ——以新北市貢寮區為例

劉瑤潔

「有一天，我前往山上想問一個姐妹是否要加入協會，但姐妹並不知道有我們這個協會，而且還被夫家限制在家中！」默默想起自己及周遭姐妹也曾有這段過往……。 (新住民姐妹)

壹、前言

我國的跨國婚姻現象溯及1980年代，隨著時代推移，許多的新住民已在我國落地生根，截至2022年6月底，新住民人數是572,733人（中華國內政部移民署，2022），已成為我國「第五大新興族群」。惟纏繞新住民「問題化」論述仍然存在！在我國待越久的新住民，越能感受夫家及社會投射的偏見及歧視目光，深刻感受污名及所處的弱勢地位（王翊涵，2012）。

此外，多數新住民經歷語言及社會的適應問題，尤其在鄉下或農漁村為主的

鄉鎮，新住民面對大家庭及傳統價值觀束縛，易對新住民發展社會網絡造成阻礙（潘淑滿，2013）。筆者曾擔任貢寮區區公所承辦，在社區服務多年，透過訪談了解新住民在地生活十多年的經驗，發現地方仍存在許多偏見及阻礙社會網絡發展的困境。新住民族群要衝破偏見框架，除落實培力，更需回應社區需求，因社區是新住民生活的場域，社區的正負向觀點相對影響看自身之觀點。

本篇透過實際案例說明這群來自異國姐妹如何「充權」自身，創造符合在地脈絡的社區服務策略；貢寮區多以農漁業為主的鄉鎮，截至111年6月底總人口為11,377人，65歲以上人口2,790人，人口老化24.52%，為超高齡社會（新北市政府民政局，2022）。因此，新住民的社區服務皆緊扣超高齡社會議題，在這過程中，也同時翻轉社區的偏見及改善在社區的處境。

本研究以新北市貢寮區新住民實踐社

區服務為研究範疇，透過案例分析培力及協力治理概念，並討論新住民的結構化困境、區公所與民間團體搭建夥伴關係的優勢與困境，最後再提到這群來自異國姐妹如何創設符合在地脈絡的社區服務策略，冀希本研究提供現行實務參考。

貳、扎根培力及協力模式

一、在社區中發展培力

（一）新住民面臨結構化的困境，同時展現優勢與力量

1. 新住民面臨的結構化困境

新住民遭受歧視的困境來自我國社會輿論、官方論述、媒體評論與文獻傾向「過度問題化」的現象（戴世玫等人，2015），由於母國經濟較為弱勢及文化價值觀的差異等因素下形成「社會監控」的權力表徵，對新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形成的社會排除，被視為理所當然（陳燕禎，2008），致使新住民掉入偏見與歧視的泥沼，如夏曉鵬（2002）指出媒體以「外籍新娘來臺賣淫」、「買賣婚姻、破碎家庭」等形容外籍配偶。此外，未經時間培養情感的基礎下共組家庭，夫妻之間的信任關係與溝通方式缺乏穩固的基礎，且在男大當婚的意識下所催生的仲介婚姻，無論共組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其家庭的性別觀念都偏向傳統，多有夫家限制新住民踏出家門的案例（夏曉鵬，2002；馬宗

潔，2011；潘淑滿，2013；陳玉華、伊慶春，2015）。

2. 培力（empowerment）的概念

培力，又稱賦權、充權，指面對社區或社會的無力感，強調爭取對生活的主導權，區分個人及集體培力，個人培力指自主自決、個人擁有無限潛力；集體培力則是攜手打破孤立，彼此共同學習成長（游美貴，2013）。

3. 成立組織，展現自身能量

集體培力是可以實現的藍圖，首先培力新住民對於逆境的韌性、自發組織動員並爭取權益，扭轉從接受服務者到服務供給者角色（夏曉鵬，2002；張智雅、曾薔霓，2011）。因語言隔閡導致建立社會資源網絡受阻，加諸整體社會的社會排除、社會關係網絡薄弱等因素，使新住民容易落入被社會歧視的弱勢情境，因此新住民相關政策亟需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共同化解新住民在社會參與上的困境（陳燕禎，2008）。

（二）培力的策略

個人的使能重要，如何善用社區資源趨向文化包容境界更加重要，培力不僅單看個體，同時需反思社區或社會結構。若新住民缺乏原生家庭資源，則建構社區的非正式支持網絡便相對重要，視「社區為資源綠洲」並發展社區資源，將社區資源轉為助力（游美貴，2013）。因此，培

力策略宜聚焦在社區場域，擴展社區參與機會及提供新住民擔任講師管道，茲說明策略如下。

1. 辦理華語識字班的反思

識字班是充權策略，也是促進新住民社會參與的機會（陳燕禎，2008；張智雅、曾薈霓，2011）。反思筆者曾辦理為期半年的「中文識字班」，邀請臺北長期教新住民識字的導師，然而來參加的新住民人數稀少，經詢問幾位新住民，她們認為「我們都來臺這麼久了，怎還在學中文！」覺得上課是莫須有「污名」，而不願參與。

如同林慕愷（2020）提及偏鄉農村社區中、老年新住民因白日務農、身心疲累難以有心力學習，來臺數十年，學習華語非必要選擇。因中老年新住民為負擔主要家庭經濟者、社會關係薄弱，且所處地區少有經濟及資訊流動情形，有學員直接反駁學習華語的必要，且參加社區華語班，如同將母國標籤烙印再度呈現於社區，開課過程中有停擺情形。

後來為改善污名，將課程名稱從「中文」改至「華語」，並以拍攝影片方式，課後讓有興趣的新住民姐妹從影片學習。然而，即使更改課程名稱、增加影片學習管道，但開班現場仍是門可羅雀。經探究參與人數低、缺乏動機等因素，與林慕愷（2020）研究一致發現家庭覺得上課可能提供新住民外出機會、假日是新住民工作

時間、課程名稱及內容如同污名化等均是影響新住民參與的因素。有了挫折才有思考改變的機會，因此後續將多門課程移至晚上且邀請社區共同參與及修正課程名稱，排除只「專屬」為新住民開課的感覺。

2. 成立新住民服務處

找尋一間活動中心的閒置空間作為「新住民服務處」，藉由公共空間談心以解相思之愁及建構非正式支持網絡，另外媒合燦爛時光書店與誠品書店管道捐贈的東南亞書籍，讓新住民之子女有學習第二母語的管道。

當時新住民服務處的構想，曾被社區部分人士反對，也曾有人認為新住民以「外來族群」的身分進入社區，有排擠「本地人」資源的疑慮。新住民服務處的成立，係由當地社區的里長多方斡旋，與在地居民協商及公所長官支持下方可成立。若無當地里長喚起社區居民的重視、認可，即使公所強力推動，也只是引起在地居民的反彈，更可能使新住民的負向標籤更為明顯而影響社區的接受度。

此外，新住民服務處所在里別的新住民人數凌駕貢寮其他里別，加上里與社區為同派系，提供公所日後推廣社區交流順暢的契機，且為新住民執行社區方案奠立基礎。

3. 家庭及社區參與策略

「社區參與」改變新住民女性配偶因

語言、文化的差異所導致的孤立情形，社區、政府藉由拓展社區參與管道（如：節慶規劃與展演、社區媽媽教室的交流），與社區居民建立雙向交流的互動關係，進而培養新住民能力、建立完整的支持網絡（張智雅、曾薈霓，2011；戴世玫，2013）。

新住民因已居住多年，有些姐妹已認定臺灣是第二個家，總想要做什麼？跟新住民姐妹訪談聊到：「剛來臺灣時，也是有被限制在家中，是最近才可以出來」，她們不是不走出來，而是很多時候「沒有這個機會」。如同陳燕禎（2008）指出夫家與新住民生活圈緊密相連，故其社會網絡是封閉的，且夫家害怕他們交到壞朋友，進而阻礙社會網絡的建立。

(1) 擴大新住民社區參與機會

公所以「多元文化串連社區營造」宗旨向文化部申請社區營造經費，這筆經費為貢寮澆下希望的種子，計畫內容有社區才藝班、社區導覽培訓、中文識字班等，為促進社區與新住民交流，有別公所均平日白天辦理，將課程移至平日晚上或假日，此時新住民或民眾下班方可參與，且培育新住民擔任工作人員，讓社區看見她的能動性（agency）。另外，媒合移民署及新住民家庭中心辦理多場活動，其中穿插教導民眾製作越南春捲及甜點等日常小吃。

公部門舉辦的藝文活動普遍不太獲得重視，若與在地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

會共同辦理社區藝文、康樂等活動，將能發揮凝聚居民情感（趙永茂、陳銘顯，2016），尤其以人際網絡密切的貢寮更為重要。公所辦理社區活動同時，無形也提供新住民與我國婦女交流機會，因來參加活動者，大多是婦女。如張智雅與曾薈霓（2011）指出臺灣姐妹對他們的接納與同理，國人對新住民的差異開放認可，是邁向多元共融的契機。

(2) 培力新住民擔任講師

為促進雙方交流，辦理多元文化交流課程，會邀請新住民擔任講師，如辦理真人圖書館、製作越南餐點。藉由區公所搭建平臺展現主體性及文化，例如，辦理大型活動時，邀請新住民展演舞蹈、園遊會設置異國攤位，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長者跟筆者說：「我沒有想到新住民文化是這樣，覺得跟之前印象不一樣了」。

(3) 家庭的共同加入

辦理社區導覽員培訓課程時，邀請在地文史工作者及耆老共同踩點並盤點貢寮文化，值得關注的是，有新住民跟先生共同成為導覽員，甚至婆婆一同參與課程，並提供小旅行的建議。

二、與新住民關懷協會搭建協力模式

(一) 為什麼要建立協力模式？

1. 協力模式定義

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指公共機構與民間部門等多元利害關係

人，透過開放、深度、集體策劃公共政策（Ansell & Gash, 2008），包含六項準則：（1）公部門發起的程序；（2）參與者包含非政府部門之利害關係人；（3）參與者直接參與決策，而非僅公部門諮詢對象；（4）程序包含建立正式組織並藉由會議持續運作；（5）以達成共識為目標；（6）聚焦公共政策。

2. 回應複雜多元性的公共議題

區公所為面對民眾的第一線，更直接面對日益複雜的公共議題，再加上新住民等跨國人口、地方創生等邊緣公共議題鑲嵌在社會問題，公共事務無法僅靠單一部門完成，需整合、開發及運用民間部門的資源，以因應在資源上的侷限（趙永茂、陳銘顯，2016）。

3. 面對公所經費不足、公所人員流動率頻繁及社區老化比率高

(1) 公所經費不足

區公所不是法人，無獨立財務預算之權，且預算統由市府管轄，涉及大型工程經費需向市府申請（趙永茂、陳銘顯，2016）。以貢寮區公所為例，除特定的端午節慶、模範父母親表揚有本預算支應，若透過本預算執行其他社區藝文經費，幾乎窒礙難行。核四停建前尚有臺電回饋金供社區申請補助辦理活動，然而核四停建後，社區若要籌措經費，則需要向新北市政府或中央申請，這使社區卻步。

(2) 公所人員流動率頻繁

此外，公所流動率高，不易維持穩定人力，執行社區業務會產生斷層，與社區建立關係需長期累積，另外申請局處經費不單單是「多出來的業務」、也考驗承辦的計畫及執行能力，對經常更迭的新人來說，可能是嚴峻的挑戰。區公所角色作為市政府各局處與在地社區的整合平臺，對於在地的公共事務扮演整合意見與資源的重要角色，面對許多創新的政策與業務（如：申請文化計畫），也要公所內部長官是否對「多元包容」有一定共識，方有推行可能。

(3) 社區老化比率高

貢寮為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比率高、缺乏青年與中壯年人口的參與，面臨苦無人力執行社區事務，向新北市政府或中央申請計畫更使長者望之卻步。在社區老化比率高且交通不便的地方，一直面臨「社區如何動起來」困境，因此需挖掘社區新興能量。然而新住民族群已定居十多年，對貢寮生態、文化已有一套想法，為何不搭建與我國居民「溝通的橋樑」，有時候不是誤會，而是彼此不了解所造成。

關於升格後，可能使人口減少、老化、多族群的偏遠地區產生更邊緣化情形，因此更需要健全社區發展，避免區域的發展遲緩而加深邊緣化情形，應強化民間團體倡議，及重視多元性帶來活力的資產（趙永茂等人，2016）。

接續此三點因素，輔導新住民關懷協會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創新性補助計畫（彌補經費不足）、培力新住民作為社區新興力（因應社區老化比率高、彌補公所人力不足），本研究以Ansell與Gash（2008）協力模型的角度，檢視貢寮區新住民方案案例中的合作面向。

（二）協力模式的介紹

Ansell與Gash（2008）提出協力治

理模型（圖1），建構初始條件、制度設計、協力過程到催化型領導（含培力）面向，可惜的是兩位學者未說明結果為何。

1. 初始條件（Starting Conditions）

指利害關係人參與協力中成功或阻礙因素，過往經驗影響利害關係人是否參與協力，若相處良好，參與動機則增加。大部分參與協力は自願的，若權力或資源的不對等，將影響參與動機（Ansell & Gash, 2008）。若起初合作關係是不愉快的，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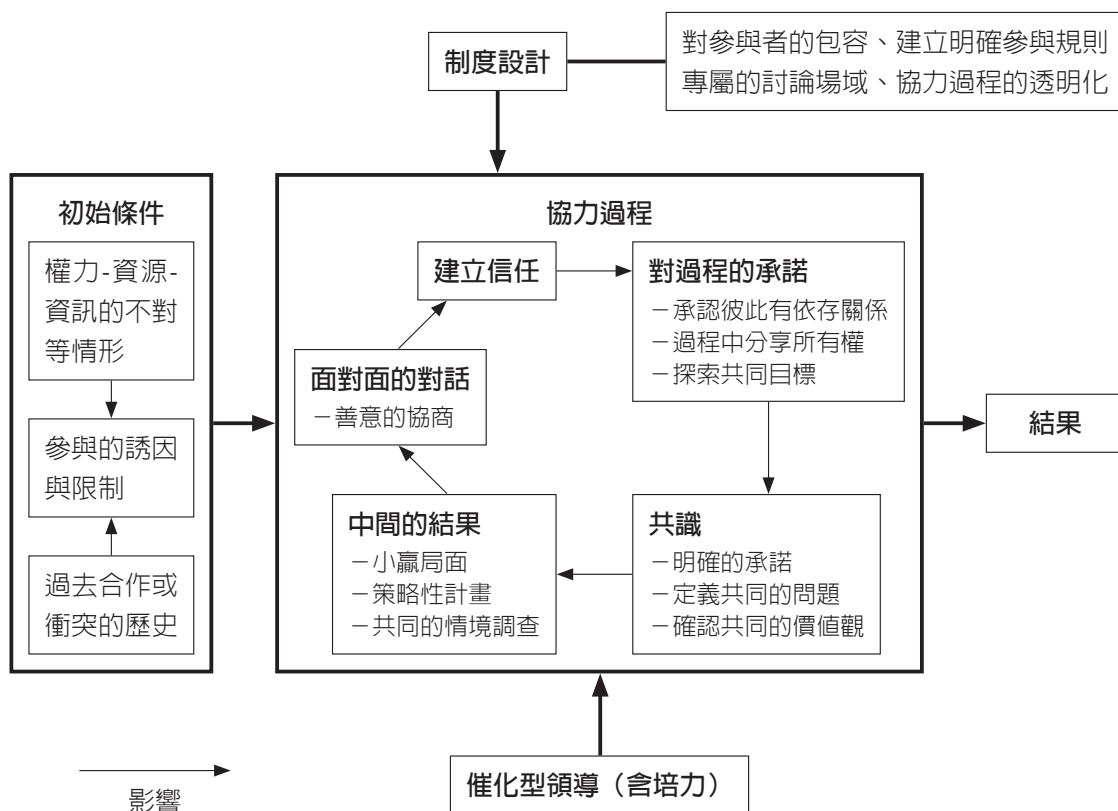


圖1 協力治理模式

資料來源：Ansell與Gash（2008）。

力則趨於失敗（Ansell et al., 2020）。

因過往經驗邀請新住民參與活動已建立良好關係，鼓勵新住民姐妹自主的發想、構思、尋找資源、找尋合作單位等。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去思考何種社區服務符合現況。他們長期在社區中蹲點，來臺灣這塊土地10幾年，也想被這個社區所重視，思考何種方案是最適合社區的，最能代表新住民的特色以及展現破除偏見的方案；方案內容皆有與新住民團體討論與研議，例如，確認執行過程、經費及人力分配。

除上述情況外，新住民關懷協會能否邀請新住民參加，克服因素包括有新住民的家庭是否有「放人」意願、經濟情況（一天可能要兼二份工作扶養家計）、新住民的動機與意願等均須被考量。

2. 催化型領導

（Facilitative Leadership）

領導是協力的關鍵因素，目標是凝聚利害關係人參與協力，促成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例如領導者協調並解決參與動機薄弱、權力和資源不對等情形，以協助協力順利（Ansell & Gash, 2008）。其次，建構參與者的溝通網絡、確保彼此溝通順暢及維持對參與者的承諾（Ansell et al., 2020）。

在協力的過程中，面臨創新型計畫執行進度、人力的分配及經費合理性，及擔心過程中是否導致團體成員的疏離。此時，由協會理事長透過領導解決困境，逐步磨合、修正及控管流程。

3. 制度設計（Institutional Design）

確立清楚的基本規則、確保互動過程的透明性及強化互賴關係（Ansell & Gash, 2008）。此外，協力的場域若是「獨一無二的」，更能激勵參與者的意願。本案例中，召開實體會議及Line上公佈執行進度、活動辦理情形及徵詢每場次想參與的人員，不會讓其他新住民姐妹認為是少數人操控執行，以提升共同的參與感。

4. 制度過程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Ansell與Gash（2008）指出信任是建立協力重要基礎，且協力過程是循環的，很難界定從哪個環節開始，制度過程具備以下特徵。

(1) 面對面對話（Face-to-Face

Dialogue）：建立以共識為導向的溝通基礎。

(2) 建立信用（Trust-Building）：

如果一開始合作關係良好，則有效建立後續信任。

(3) 對過程的互相承諾（Commitment

to Process）：對「成員的承諾」是促進協力關鍵，確保彼此的觀點不會被忽視，建立參與式民主的精神。

(4) 共識（Shared Understanding）：

利害關係人要共同完成並實現目標。

(5) 中間的結果（Intermediate

Outcomes)：製造彼此的「小確幸」，這些反饋可使協力更為順暢。

參、共融：創設社區服務策略

培力新住民時，要跳脫「為她們好」的思考模式，讓其自主決定、參與及發聲（張智雅、曾薔霓，2011）。培力姐妹獨立向市府申請提案，由筆者教導撰寫計畫、執行課程及活動等，因貢寮是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嚴重、新住民已成為貢寮區生力軍，然而偏見及歧視無所不在，她們要走出來面對結構困境，實屬不易。

新住民關懷協會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創新性補助」計畫，這個方案以培力新住民出發，邀請志同道合姐妹共同發想、設計、執行、修正社區服務方案再到培力高齡長者，甚至服務範圍擴展鄰近的雙溪區，讓社區看到他們的「能動性」。筆者認為貢寮區新住民相較其他偏遠區域是個特例，因為新住民在偏鄉常常忙於家庭生計、無力參與社區，更遑論自主提案市府計畫。此外，也很少有強大動能花時間凝聚及團結姐妹的意識。

一、行動餐車結合姐妹特長：跨鄉鎮服務

（一）特色

以「深入貢寮偏壤」為號召，透過共

餐的行動專車並結合姐妹特長（如：修剪美化指甲、按摩），翻轉女性只能扮演接受施予與服侍家庭的角色。服務地點考量貢寮區位於東北角海岸，海岸地形綿長，因地形受限於深山與偏遠海邊，離市區距離甚遠，深山尚有人居住、下山極為不便（如：雞母嶺、吉林等地區），臨海區域也面臨濱海公路（如：龍洞、馬崗），因此針對沿海與山區選擇四個未辦理老人共餐的地區，擇定「雞母嶺、吉林、龍洞、馬崗」為服務場域，而在鄰近鄉鎮（雙溪），則挑選當地的公托中心進行服務。

這個服務策略為期一年，從事前場地勘評估是否符合現場料理，再到準備鍋碗瓢盆、備料並設計符合長者的健康營養料理（以東南亞料理呈現），皆是由新住民一手包辦。由公所協助提供公務車作為餐車及進行宣傳。

其中這四個地區料理的新住民廚師皆不同，值得一提有三個地區長者未參加過老人共餐，對共餐感到陌生，此外這四個地區長者即使已75歲高齡，仍務農或漁撈，他們肩膀僵硬、身體不適，經過按摩後，身心皆得到舒爽。另外，做美甲時有多位長者遲遲不敢把手交給新住民，因為指甲經過歲月洗禮變得斑駁，他們做完第一次說：「這是第一次有人幫我這樣做，指甲修剪得就水」、「按摩得就爽快」、「她們跟我的印象不一樣」。訝異與既定印象的新住民不同，取而代之是溫暖、多

才多藝；且在現場烹飪，過程中邀請長者一起共同做菜，也可相互建立支持網絡。

服務策略緣起是新住民有次前往深山區找尋是否有姐妹需要服務的，她赫然發現：「姐妹們不知道有我們這個協會，還被夫家限制在家中！」默默想起自己曾經有這段過往，希望能破除社會對新住民的刻板印象。

這是新住民姐妹第一次親自籌劃、彼此討論、安排人力、跟當地合作團隊聯繫，甚至後續核銷、成果皆由新住民獨立完成。這個之後，有詢問過新住民姐妹：「我們在這過程中，覺得自己的自信被找回來了。如果疫情結束，希望可以再來一次」！

（二）後續效應

方案結束後有二處地區的當地里長看見里內共餐服務的需要與落實的可行性，均有向市府申請「銀髮俱樂部」計畫（其中內容有老人共餐），新住民的服務不只促進社區服務的多元，也讓善心的種子扎根，建立與當地社區的正向關係。

二、世代共融：互惠互助，達成雙贏

（一）特色

服務內容以串聯多個單位合為跨世代的服務策略，如公托中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地企業、各級學校、各社區發展協會、各里辦公處，及在地商家等。

1. 舞蹈

我國民眾認識多元文化，從舞蹈開始是常見的方式之一，因此將舞蹈元素融入長者的「健康促進」，實際深入在地社區二處公托中心，為長者的身體狀況編舞，邁出曼妙的越南舞蹈步伐，長者平時透過舞蹈擺動身子、手腳併用外，並在公所舉辦的中秋晚會活動進行成果發表會，將長者的舞蹈當作其中表演項目，並且邀請行動不便的長者走出家門，一同在活動舞臺上坐在椅子上舞動筋骨，而舞臺底下的家屬看見家裡長者的輕快舞姿，每個人的臉上都難掩雀躍之情。

2. 烘焙

不同於都市資源豐沛，民眾下班常常無處可去，為讓大家能夠參與社區活動，籌劃辦理「烘焙手作坊」，邀請社區居民製作餐點，做完的烘焙餐點，隔天即送至社區照顧據點供長者食用。

3. 社區導覽

藉由文化部社區營造經費辦理社區導覽培訓，培育新住民擔任社區導覽員，後續承接市府的志工交流、山藥小旅行，並開始對外接團等，社區導覽行程融入貢寮特色—鮑魚殼文創商品及石花凍，帶領民眾親手製作這兩樣在地文化特產，塑造深度旅遊服務口碑與品牌，與在地商家合作以提升在地旅遊服務，開發在地特色文創DIY手作體驗，使地方產業永續發展。

4. 學校

考量多元文化交流的經驗，必須往下扎根與傳承，因此擇定與貢寮在地學校及雙溪國小，每季進行一次才藝的交流與教學活動，利用烹飪、精油放鬆、在地特產製作及社區導覽等課程，將新住民服務的活力與熱忱帶入校園。

（二）後續效應與反思

創新性補助計畫雖僅有一年的期程，但對於培育社區人才、永續社區工作推動及提升新住民自我認同等後續影響卻不容小覷。它鍛煉新住民新的社會技能，如成為社區導覽員或是獲得烘焙技藝而創業，也因貢寮地區缺乏麵包店，若民眾及公家機關需要購買餐點，能逕洽採購，此外由區公所舉辦大型活動的展演販賣，及辦理會議餐點，都是他們建立口碑與自信的重要機會。

政府的方案存有許多潛在危機，例如方案通常僅補助一年，若無時間有效規劃人力、經費與自籌款項支出，則社區的永續性及能力可能趨向萎縮，此外，在政府預算控管下方案的經費補助，均要評估計畫內容及執行能力，密密麻麻的補助原則，對於不諳中文與電腦文書的新住民及高齡社區的長者來說是一大困難，她們的卻步進而讓社區呈現萎縮，雖然活動都是一次性，然而倘若每次例行性的成功經驗能持續累積，就是凝聚意識的開始。

因此，新住民若有動機或想法，政府應主動搭建創造機會的平臺，她們身分不因母國而有被剝奪社會參與的「特殊性」，事實上她們與一般國人無異，唯獨口音的不同，而喚起民眾對新住民的「負面標籤」，這些既定的刻板印象，都需藉由參與社區的交流，一點一滴的滴水穿石般瓦解偏見與歧視。

執行服務策略不僅僅是活動、課程、社區交流而已，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凝聚新住民的自信及意識、就業技能及第二專長，均是不會隨時間消逝的資產。王翊涵（2018）指出，新住民擔任志工從「給予協助者」變為「服務者」，翻轉社區、夫家的污名與歧視，讓其看到能力展現。不過現實中，由於新住民處於多種的弱勢情境，諸如缺乏得知參與志工的管道、經濟條件的弱勢，及經歷偏見歧視產生習得無助等窘境，均可能使之對擔任志工卻步，但正是因為這個服務策略使新住民產生對於其他社區團體以及在地網絡連接的認識，進而有動機從事志願服務，並且更有心得的創造新的服務策略。

三、自助互助：成立新住民關懷服務站 通譯人才

培力新住民成為新住民關懷服務站的志工，服務內容提供電話關懷、個案管理、通譯服務，以及建構資源網絡，如遇服務對象有多重需求與困境，則轉介公所

或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進行後續服務。通常新住民關懷站會接到市府的個案資料再進行電話關懷服務（通常為剛來臺的外籍配偶，不過因為貢寮人口多是移出人口，已許久未有剛來貢寮的外籍配偶），因此新住民關懷站承襲既有的任務，並由志工主動挖掘需要協助的新住民，進行電話關懷及轉介服務、透過自己的經歷協助個案走出困境。

肆、結語

新住民在社區中執行社區方案，除面對偏見與歧視的結構性困境，因語言及社會互動的不適應導致社會孤立，在拓展社會網路與社會參與的各種過程，都比我國民眾更加的困難。此外，從事社區活動除熱忱外，尚須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點方能社會參與，種種的因素更凸顯這個方案實屬不易。

在偏遠公所執行社區業務，不但要執行市府交辦事項，更要傾聽來自社區不同團體對於資源分配的聲音，適時化解資

源被單一族群使用的質疑或誤會，在平衡社區資源分配同時，也要同時協助社區挖掘青年學子。此外推動工作的時必須降低長者與新住民對於電腦使用及文書上的困難，社區工作者一開始可以協助並教導他們如何操作電腦，社區成員開會討論過程中，透過紙筆紀錄下來他們的理念構想，後續再培養幾個核心幹部去執行社區共識的理念。

鼓勵新住民公共參與的機會，政府部門除面對新住民時應具備多元文化敏感度外，尚須喚起並激發在地社區的理解與認同，藉此打破僵化的社會結構，整體社會網絡亟需政府部門與社區協力灌輸社會資本、落實社會投資精神，讓不同文化有對話及交流的空間，實踐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擴大這群女性在社區可以展現優勢的資源及機會，藉此達到文化平等的真諦。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

關鍵詞：新住民、培力、協力治理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22年7月25日）。〈統計資料，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 王翊涵（2012）。〈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台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台

- 灣社會研究季刊》，89，83-125。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1212.0003
- 王翊涵（2018）。〈與姐妹志工一起工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支持性志願服務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2（2），49-94。https://doi.org/10.6785/SPSW.201812_22(2).0002
- 林慕愷（2020）。〈臺灣偏鄉農村社區中、老年新住民華語讀寫教學研究〉。《臺灣華語教學研究》，20，33-56。https://doi.org/10.29748/TJCSL.202006_(20).0003
-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馬宗潔（2011）。〈壓迫概念之認識：以服務新移民工作者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2），39-77。https://doi.org/10.6785/SPSW.201112.0041
- 張智雅、曾薈霓（2011）。〈台灣新移民女性配偶社會參與之研究〉。《嘉南學報》，37，416-430。https://doi.org/10.29539/CNABH.201112.0012
- 陳玉華、伊慶春（2015年5月1-2日）。〈台灣民眾對於婚姻移民的社會態度〉（會議論文）。台港社會學與社會意向研討會，臺北市，臺灣。
- 陳燕禎（2008）。〈台灣新移民的文化認同、社會適應與社會網絡〉。《國家與社會》，4，43-99。https://doi.org/10.30174/JSS.200806.0002
- 游美貴（2013）。〈理論和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載於潘淑滿主編，《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頁39-62）。巨流。
-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2022）。〈各區人口統計〉。2022年7月25日，檢索自https://www.ca.ntpc.gov.tw/home.jsp?id=a568_8376c95574b4
- 趙永茂、陳銘顯（2016）。〈臺灣地方治理的發展與限制：以臺北市大安區為例〉。載於趙永茂編著，《民主發展與地方治理變革》（頁123-148）。臺大出版中心。
- 趙永茂、陳銘顯、王皓平（2016）。〈建構多元中心的都會治理：反思都市不對稱與民主赤字問題〉，載於趙永茂主編，《民主發展與地方治理變革》（頁149-184）。臺大出版中心。
- 潘淑滿（2013）。〈新移民發展趨勢〉。載於潘淑滿主編，《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頁1-18）。巨流。
- 戴世玫（2013）。〈新移民社會工作方法〉。載於潘淑滿主編，《新移民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頁63-92）。巨流。
- 戴世玫、黃于珊、洪安琪（2015）。〈優勢原則運用於新住民服務的回顧與評析〉。《社區發展季刊》，149，299-310。
- Ansell, C., Doberstein, C., Henderson, H., Siddiki, S., & Hart, P. (2020). Understanding inclusion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Policy and Society*, 39(4), 570-591. https://doi.org/10.1080/14494035.2020.1785726
- Ansell, C., & Gash, A.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543-571.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m032